


與魯迅為「鄰」



燈下集
霍無非

打記事起，我家居住在廣州原國立中山大學的西堂，即現時的文明路二一五號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所在地，在這座西式老建築裏生活，我度過了幼兒園中班至小學二年級的童真時光。

建在古代貢院遺址上的原中山大學校園，學風嚴謹，人文氣息濃厚，以此為輻射，形成了老廣州的文化圈。高挑的大鐘樓鶴立雞群，曾是廣州城的一座標誌性建築，也是魯迅在廣州的「家」。九十四年前的年初，魯迅應邀來中山大學任職任教，與他的同鄉兼同事好友許壽裳，在校內大鐘樓二樓會議室旁的一間房內住宿辦公，在此籌劃校務，接待來訪，讀書寫作，度過了約七十天時間。魯迅床邊的窗口朝西，透過婆娑樹影，正好對着西堂，那兒是中山大學的教學區，作為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大先生」魯迅，時常穿着長布衫，夾着講義，往來西堂與鐘樓。

我家搬來西堂時，魯迅離開廣州已三十五年了，逝世亦有二十六年。依稀記得，西堂樓分兩層，回字形結構，宿舍教室改造成住宅，中間空地長着木瓜、柚樹和各家擺放的盆花，居民使用公用廚房和廁所，雞犬之聲相聞，每家有兩個門，分別通向裏側和外側走廊。我家鄰居是一家伍姓華僑，男主人華髮梳得一絲不亂，常坐在英文打字機前噼噼啪啪打字。他家三個子女，大女兒在原中山醫學院上學，二女

兒讀中學，小兒子長我們幾歲，我們喜歡跟着他屁顛屁顛玩耍。

西堂南側正門外，原是塊坑窪不平的泥土院子，長着粗壯帶刺的木棉樹，西堂與大鐘樓之間，成排的石栗樹挨着牆，門外的草坪和東端盤根錯節的大榕樹是原有的格局，草坪邊上長着叫不上名的灌木。孩子們用彈弓射木棉，爬牆勾石栗果和白蘭花，在草坪上放紙鳶，連停歇在灌木叢上的黃蜻蜓，夏夜則在草坪上捕捉忽明忽暗的螢火蟲，用廣州方言說，好「百厭」（調皮淘氣之意）。我至今沒想明白，當初咋就沒一點到隔壁大鐘樓玩的印象，是不讓小孩進去或是年幼時我們不懂魯迅？

但那時，家裏來了客人，有文化的大多要去已闢為廣州魯迅紀念館的大鐘樓參觀，景仰魯迅在廣州的人生經歷。我的父親曾有一套一九五八年人文社出版的《魯迅全集》，整齊擺放在藤書架上，不苟言笑的父親不時取出閱讀。我的母親有次牽着我們照相，以大鐘樓作背景，母親的臉上掛着幸福的笑容。長大後再翻看這張老照片，哦，原來我家與魯迅的住處挨得這樣近，與魯迅做過「鄰居」，儘管不是一個年代。以後我家搬到別處，再遷到外省，與西堂和大鐘樓似乎漸行漸遠。

即便這樣，與故地並沒有了斷。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來廣州，見到西堂鄰家我們稱小姐姐的二女兒，她是一家幼兒園的負責人，即



▲廣州大鐘樓二樓魯迅宿舍。 作者供圖

將要到國外與家人團聚了。巧的是，一位兒時夥伴在廣州魯迅紀念館工作，與此長相廝守了。隔十多年回來，有一種到家的感覺，雖然西堂已拆，但鐘樓仍在，可與「鄰居」魯迅的往事作近距離的接觸。對比家裏珍存的老照片，建築變化蠻大，西堂舊址建成圖書館，舊貌換新顏，館廳寬敞明亮，門前花木扶疏，路面平整美觀，讀者絡繹不絕。而大鐘樓呢，單是圍牆就大不一樣，由過去雙層塔柱和瓦當裝飾的高牆，改成稍矮的柵欄式圍牆，院內景物，盡收眼底。

這三十多年，我來此參觀過多次，魯迅紀念展也在更新變化着，魯迅白色半身雕像器宇軒昂，神態堅毅，通過文字介紹、圖片記載、複製物件及燈光襯射，表現方式突破傳統，含有科技元素，全方位地還原了在廣州的魯迅。

站內芭蕾



黛西札記
李夢

自從古巴裔美國知名編舞家衛承天(Septime Webre)上任香港芭蕾舞團（以下簡稱「港芭」）藝術總監以來，「港芭」的推廣宣傳亮點頻頻：先是在香港數個地標景點拍攝的宣傳片在內地多個視頻平台走紅，還有疫情期間為幫助居家人士鍛煉健身而拍攝的「舞蹈員特訓」短視頻系列，再就是最近與港鐵（MTR）合作的、頗為亮眼的芭蕾普及項目「地下鐵碰着芭」（The Ballet Encounters @MTR）。

近年「快閃」概念十分流行，不少樂團和舞團紛紛策劃在機場、港鐵和車站內舉行「快閃」演出，香港青少年管弦樂團快閃香港國際機場，以及不久前香港管弦樂團的「享樂在港鐵」項目等，均是例證。香港芭蕾舞團此番在港鐵彩虹站和灣仔站分別拍攝兩條創意舞蹈影像，請來一眾男舞者在港鐵車站內遊走、舞蹈，與站內的雕塑等藝術品互動。故事性強，舞者的肢體語言誇張，服裝道具搶眼，無怪受到熱議。


短片「陶醉的芭蕾舞者@彩虹站」中，一眾復古書呆子造型打扮的男舞者迷上了三座體態優

美的女芭蕾舞蹈員青銅雕像，企圖用舞姿吸引她們的注意：「這是灣仔@灣仔站」則以車站內「這是灣仔」寫實照片為背景，舞蹈員以戲謔式的舞姿在站內不同場景間穿行，活力蓬勃，與灣仔地區熱鬧繁忙的氣質頗為契合。港鐵站因此不再只是市民或旅客匆忙趕路、偶爾停駐的尋常場所，而成為創意、想像和藝術繽紛碰撞的平台。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港芭」此番在港鐵站內的推廣活動，每每能從站內既有的氣氛與陳列的藝術品汲取靈感，再增添新奇元素，故不覺得刻意生硬，而能予人親切之感。

期待未來，「港芭」與港鐵再合作，根據不同車站特色，拍攝系列影像作品，更增加與不同地區社群的互動，例如邀請中環上班族、深水埗基層家庭小朋友、元朗或上水新來港人士等參與短片拍攝，與舞蹈員合力完成創作。如是，既能面向大眾普及芭蕾舞，又能促進社會共融，更有助於提升香港國際形象並符合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之願景，多贏之舉，何樂不為？

▶「這是灣仔@灣仔站」。香港芭蕾舞團供圖

夢醒時分



英倫漫話
江恆

幾天前的傍晚，手機突然跳出一條語音留言，按下播放鍵，隨即傳來熟悉的聲音，「老兄別來無恙啊，方便時咱們通個話。」這是我一位認識多年在倫敦金融城工作的朋友，算起來我們已大半年沒有聯繫了。

看一下時間，此時正是英國早上九點多，通常他都非常繁忙，今天竟有如此雅興，看來是比較清閒。我的猜測果然沒錯，通話之後才知道，他在幾個月前已從金融城辭去了工作，目前待在家裏成為自由職業者，這也意味着他不必再像過去那樣朝九晚五的上班了。更確切地講，他自從去年初倫敦因疫情爆發封城後，便再沒回過金融城辦公室，一直處於遙距工作狀態，如今他算是徹底解放了。用他的話說，經過一年多居家，已經習慣了這種模式，不想改變了。沒想到，他也成了「大辭職」（the Great Resignation）浪潮中的一員。

說起「大辭職」，關注新聞的人對此應該並不陌生，這個由美國管理學教授安東尼·克魯茲發明創造的詞彙，幾乎一夜之間成為流行語，頻繁地出現在西方各大媒體之上。按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克魯茲顯然借鑒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一詞，雖然說兩者在程度上不能相提並論，但都屬於有着時代特點的社會現象。按調查機構的統計，這場大疫情之下的「大辭職」浪潮可謂來勢迅猛，以美國為例，今年四月辭職人數接近四百萬人，突破了二〇〇〇年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在此之後的幾個月裏，辭職人數節節攀升，九月份的數字已達四百四十萬人，辭職率更是創紀錄的接近百分之三，也就是說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以十萬計的人辭去工作。

這股辭職潮也吹到大西洋彼岸的歐洲，英國是深受影響的國家之一。與美國的情況類似，英國的餐飲、零售、醫護和社工等行業也是辭職人數較多的領域，當然像醫護、零售等工作原本就因為脫歐而導致人員短缺，如今更是雪上加霜。但英國有個尤為突出的趨勢，即不少白領也成為辭職的主力軍，就像我那位在金融城工

作的朋友，他們辭職的原因也很接近：習慣了居家工作，不大願意重返舊模式。英國民調機構的數據也支持這種結論，比如Momentive的統計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表示，若僱主要求他們恢復全職工作並在辦公室坐足至少八小時，就寧願辭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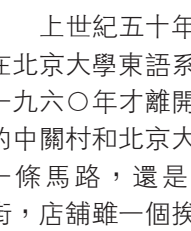
除了希望居家辦公而辭職者之外，其他人又是基於什麼原因辭去工作呢？按照管理學專家馬茲涅夫斯基的說法，參與「大辭職」的人大致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那些在「水深火熱」與生存之間做出選擇的人，比如某些行業的僱員經常要忍受低薪和加班加點等較差待遇，如今疫情令工作環境更加惡劣，他們覺得再做下去將不堪重負，必須辭職來改變這種局面。又或者人們經歷了重大變故，包括自身在疫情中染疫或者目睹別人患病及死亡之後，開始反思和頓悟人生，他們因此改變生活態度，認為不能一切只圍繞工作，希望辭職後能夠尋找到生命的意義。

另一類則是在好與更好之間做出選擇的人，比如英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持續發放保就業補貼計劃(furlough scheme)，讓人不工作也有錢拿，加之環球「放水」的寬鬆政策，刺激股市和樓市齊升，受惠於此類財富效應，人們在考慮辭職時變得底氣十足，認為保持現有狀態才是他們想要的美好人生。還有那些高職位、高收入的經濟條件優越的群體，他們在疫情期間飽受居家的困擾，因而辭去大都市繁忙的工作，轉而回歸原始鄉間享受生活，就像

這些年我閱讀了魯迅許多作品，日記和通信且是反覆讀，仍覺不夠，遂生心願：讀魯寫迅，何不把自己的見解感悟寫出來？這些年，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有關魯迅的文章，有時文思枯竭，或是寫得不滿意的時候，就停下來，抽空到大鐘樓或廣州其他魯迅涉足的地方轉轉，靈感就來了，問題大多迎刃而解。敲動鍵盤的手指，是難以停下的。

魯迅當年為廣州的讀者着想，在中山大學附近的芳草街四十四號二樓租房開了家北新書屋，主要經營未名社和北新書局出版的進步文藝書籍，提供精神食糧，離開廣州前清盤停業。作為魯迅的讀者，我曾去芳草街一探北新書屋舊址，然遍尋未果，據資料記載，該書屋舊址毀於火災並重建，面目全非。沒想到在大鐘樓地層拐角一處粵式趟櫥門裏，見到芳草街四十四號北新書屋，這也是「魯迅的遺物」啊，廣州魯館人為北新書屋找到了最好的歸宿，過去我咋就粗心沒印象呢？室內成排的落地書櫃擺滿魯迅的著作，牆上掛着多幅魯迅作品的版畫，中間幾張桌椅可供小憩閱讀，管理員說，基本是按北新書屋的原樣布置的。館內還藏有魯迅的真品，一張刻着「早」字的書桌，原來魯迅也愛刻字自勉。室內靠窗的一張長桌，擺着印章印泥若干，進出的參觀者，在參觀券上寫下感言，蓋上具有紀念意義字樣的印章，魯迅仍然活在人間。

中關村往事



人生在線
延靜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東語系讀書，一九六〇年才離開。當時的中關村和北京大學只隔一條馬路，還是一條小街，店鋪雖一個挨一個，都是飯鋪、油鹽店、山貨莊等小店。記得有一年過春節，全班同學在那裏找了一家飯鋪團聚，當時我們都慶幸有這樣一個地方聚會吃飯。

離開北大後，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重返過東語系，那是為了取回我們在校時參與編纂的《朝漢字典》。記得進入東語系大樓，還碰到季羨林先生，而且他還叫出我的名字，他的記憶力實在驚人。經過中關村時看到，仍是一條老街，沒有多大變化。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國家

發展進入快速道，中關村的面貌終於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九十年代末，我們去北大看望季羨林先生，在中關村站下了地鐵出站後，眼前是寬闊的馬路，現代化的商店鱗次櫛比，都快找不着北。「這難道就是當年的中關村小街？」我們不禁自言自語。不得已，現問路，才找到北大的方向。

那之後我們還多次去過季老的家，每次去都發現，中關村有了新的變化。道路不斷展寬，高層建築林立。中關村其實本來是一個沒有多少人家的村名，現在卻發展成為科技創新園區。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關村也登上了國際舞台。

「喵街區」



市井萬象

近日，西安坤中巷經過藝術改造後，從灰暗單調的背街小巷變身為色彩艷麗的「喵街區」，帶來新活力。

中新社

這些年我閱讀了魯迅許多作品，日記和通信且是反覆讀，仍覺不夠，遂生心願：讀魯寫迅，何不把自己的見解感悟寫出來？這些年，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有關魯迅的文章，有時文思枯竭，或是寫得不滿意的時候，就停下來，抽空到大鐘樓或廣州其他魯迅涉足的地方轉轉，靈感就來了，問題大多迎刃而解。敲動鍵盤的手指，是難以停下的。

魯迅當年為廣州的讀者着想，在中山大學附近的芳草街四十四號二樓租房開了家北新書屋，主要經營未名社和北新書局出版的進步文藝書籍，提供精神食糧，離開廣州前清盤停業。作為魯迅的讀者，我曾去芳草街一探北新書屋舊址，然遍尋未果，據資料記載，該書屋舊址毀於火災並重建，面目全非。沒想到在大鐘樓地層拐角一處粵式趟櫥門裏，見到芳草街四十四號北新書屋，這也是「魯迅的遺物」啊，廣州魯館人為北新書屋找到了最好的歸宿，過去我咋就粗心沒印象呢？室內成排的落地書櫃擺滿魯迅的著作，牆上掛着多幅魯迅作品的版畫，中間幾張桌椅可供小憩閱讀，管理員說，基本是按北新書屋的原樣布置的。館內還藏有魯迅的真品，一張刻着「早」字的書桌，原來魯迅也愛刻字自勉。室內靠窗的一張長桌，擺着印章印泥若干，進出的參觀者，在參觀券上寫下感言，蓋上具有紀念意義字樣的印章，魯迅仍然活在人間。

英國熱門電視節目《尋找理想小鎮》(Escape to the Country)描述的那樣，欣賞麋鹿在薄霧籠罩的田野上奔跑，啄木鳥在樹叢中飛舞，靜靜傾聽晨露從葉尖滴落的聲音。

英國《每日電訊報》專欄描繪了英國人憧憬新生活可能的模樣：有一棟又大又溫馨的莊園，室內最好是石板地面，壁爐是那種復古田園風，須有一隻憨態可掬的狗狗趴在前面吐着舌頭。莊園離城市越遠越好，附近還要有商店和可愛的小酒館。在一個漫長的午後，全家人愜意地烤着火，吃着新出爐的點心，喝着下午茶；或者一起散步，孩子們一路興奮地睜大眼睛，收集着他們這輩子都沒見過的甲蟲、鳥巢和野花……聽起來是不是很難地？但這就是許多人心中的世外桃源。

還需一提的是，在辭職潮中也有「躺平」族，如同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提到的「低欲望社會」的情形，他們以年輕人居多，既不想繼續工作，也無欲無求。這些人與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在英國流行的尼特族(NEET)極為相像，就是不工作、不接受教育和培訓(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終日無所事事，以一種近乎佛系的狀態存在。

應當如何看待他們？《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艾肯沃爾德的話頗有啟示：「大辭職」不是人們不想再工作，而是越來越多的人漸漸意識到，在這個國家，美國夢已死。一同死去的，還有相信好好工作就能得到好的未來。英國又何嘗不是？